

论古代政治童谣的类型及社会功能 ——以“康衢童谣”“卜偃引童谣”为例

刘莉

(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康衢童谣”“卜偃引童谣”都是我国较早产生的政治童谣,从内容表达看,古代政治童谣可分为品评类、断言类、预言类三种类型,主要涉及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对政治局势的判断以及对政治局势的预测。古代政治童谣的社会功能主要有二,即佐证史实的补史功能,引导舆论的宣传功能。古代政治童谣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与创新性继承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政治童谣;类型;社会功能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2.02.015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22)02-0105-05

童谣,顾名思义,指儿童之歌谣,以儿童传唱方式流行,但作者未必尽是稚童。中国古代童谣大体分两种类型,儿歌式童谣与政治类童谣。其中,儿歌式童谣接近儿童生活,表达儿童感受,具有儿童趣味,当为儿童自作或成年人的拟作。政治类童谣在童谣中最受瞩目,是成年人的社会生活、政治观点的表达。钱谷融在《谈汉末童谣》中指出,童谣表现强烈的是非爱憎,其创作者一定是成人,而非儿童,就是针对这一类童谣而言的。因借童谣消解胸中块垒,表达爱憎好恶,隐蔽性强,难以溯源,这就为成人表达政治见解,尤其是负面政治观点或情绪提供了保护。现存的童谣大部分属于政治童谣:有的确实是有明确的政治意蕴、政治指向;有的却是成人的编造、附会、歪曲,因此政治童谣大多具有谏语色彩,有一定的预测功能。从内容表达角度来看,政治童谣可分为品评类、断言类、预言类三种类型,主要涉及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对政治局势的判断以及对政治局势的预测等。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封建社会,童谣成为了文人士大夫、下里巴人表达见解,尤其是批评意见的重要渠道,具有佐证史实的补史功能和引导舆论的宣传功能。古代政治童谣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做好这些童谣的传承和保护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政治童谣的类型

现存童谣大部分属于政治童谣,多保存于史书《五行志》中。对政治童谣做类型区别研究,有助于剥除政治童谣的谏语迷信色彩,从民意、舆情表达角度还原政治童谣的本来面目。

相传作于尧舜时代的“康衢童谣”,被很多研究者视为我国最古的童谣。《列子·仲尼》记载如下:

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欤,不治欤?不知亿兆之愿戴己欤,不愿戴己欤?……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尧喜问曰:“谁教尔为此言?”童儿曰:“我闻之大夫。”问大夫,大夫曰:“古诗也。”^[1]

“康衢童谣”赞美尧的美政,歌颂圣主,寄寓了百姓对清平政治的渴望、安享太平的理想。谭达先推断其中的“儿童谣”当为后世“童谣”一词之本。按其产生、传播流程,“康衢童谣”先由“大夫”创作,再假“古诗”之名,有意教读童子,童子进行广泛散播。这首童谣表达了时人的政治观点,带有时政歌的色彩。

《左传》僖公五年“卜偃引童谣”也是现存较早的政治童谣,其文如下:

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

[投稿日期]2022-02-25

[基金项目]2020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编号:2020CX129);2019年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编号:SK2019A0511)

[作者简介]刘莉(1978-),女,天津静海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焯焯,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2]

“卜偃引童谣”具有明显的占验色彩,是对军事时局的预测。杜预注曰:“龙尾,尾星也,日月之会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见。”“鹑,鹑火星也。贲贲,鸟星之体也。天策,傅说星。时近日,星微。焯焯,无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鹑火中,军事有成功也。”^[3]该童谣结合星象学,预测了晋灭虢的具体时间。

“康衢童谣”“卜偃引童谣”代表了我国古代政治童谣的两种基本类型。从编撰主体看,“康衢童谣”为代表的政治童谣属于成年人的主动创作,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意的载体。“卜偃引童谣”则可能是儿童传唱后,为成年人利用,以佐证时人的政治意见。从传播机制看,“康衢童谣”是成人教唱儿童后广为流传,“卜偃引童谣”则先有童谣流传,后成为占验的依据。从具体功用看,二者又有时政歌与造势、附会之别。作为政治观点的载体,从内容表达看,政治童谣又可以区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 品评类童谣:对政治人物的评价

以“康衢童谣”为代表的一类政治童谣专门针对政治人物的品行、功过、是非做出评价。与六朝文人品藻不同的是,童谣站在民众立场而非知识分子角度,将政治作为,尤其是能否造福百姓作为评价标准,不看重人物的精神气质、才华风韵,带有明显的功利实用色彩,一定程度上传达了民众的心声。

东汉时会稽郡流传着一首赞美太守张霸的童谣:“弃我戟,捐我矛,盗贼尽,吏皆休。”^[4]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人,东汉和帝永元中任会稽太守,在会稽任上,他提拔、任用有才之士,重视教育,会稽大治。这首童谣便是对张霸治下百姓安定生活的由衷赞美。与之类似的,民间还有关于包拯、况钟等廉吏的诸多民谣流传。《况太守集》载苏州童稚为况钟歌曰:“况晴天,朝命宣,愿早归,在新年。”这首童谣就是对曾作苏州太守的况钟的一曲赞歌。可见,歌颂清官及清官政治,表达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政治童谣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与歌颂类童谣相比,批判类的童谣数量更多,而且表达直白、尖锐。如东汉时著名的汝南童谣:“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言者?两黄鹄。”^[5]翟方进破坏了汝南郡汉武帝时开凿的灌溉工程鸿隙陂,导致百姓只能靠豆类芋根充饥。百姓期待后来者能重修鸿隙陂,造福民

间。虽然“两黄鹄”颇具神异色彩,但民情、民意、民怨已跃然纸上。晋惠帝永熙年间童谣“二月末,三月初,荆笔杨板行诏书,宫中大马几作驴”^[6],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惠帝司马衷,讽刺他大权旁落的无能。晋惠帝元康年间洛阳童谣,“南风起,吹白沙,遥望鲁国何嵯峨,千岁髑髅生齿牙。”^[6]采用双关之法,以南风代指惠帝皇后贾南风,白沙代指小字沙门的愍怀太子司马遹,暗示贾南风杀害愍怀太子之事。《十六国春秋》载北州童谣:“府中赫赫,朱邱伯。十囊五囊,入枣郎。”揭示了晋时幽州太守王浚及其党羽朱硕(字邱伯)、枣嵩等人贪赃卖法、骄奢豪横、贪婪丑恶的嘴脸。

(二) 断言类童谣:对政治局势的判断

无论是“康衢童谣”对尧的赞美,还是“卜偃引童谣”对时局的预测,都是基于对当时政治局势的认识与判断。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借助童谣判断政治形势,向当政者示警,反映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这类童谣能够广泛流传,一定程度上也契合了民心、民愿、民情。

《古今风谣》载宋真宗时童谣曰:“欲得天下宁,须拔眼中钉;欲得天下好,无如召寇老”,便是当时人的普遍共识:要想天下太平,就应除去像丁谓那样阿谀逢迎、排斥异己的小人,重用如寇准般忠诚耿介之君子。《古今风谣》又录明英宗天顺丁丑(1457年)童谣:“京城老米贵,那里得饭广!鹭鸶冰上走,何处寻鱼赚!”表达了对范广、于谦名将忠臣无辜被杀后时局混乱的愤懑。

借童谣总结时政、表达政治见解,是安全且有效的方法。齐神武时邺中童谣曰:“可怜青雀子,飞入邺城里。作窠犹未成,举头失乡里。寄书与妇母,好看新妇子。”^[7]表面讲青雀作窠未成,又远离家乡,只好给家里母亲写信,照顾好新人,暗指魏孝静帝被废一事。魏孝静帝是清河文宣王之子,“青”取“清”之谐音。把持朝政的高欢将孝静帝元善见迁到邺城,元善见到邺城五年后,新宫才建成。后来,高欢的儿子高洋称帝,又将其废为中山王。“作窠犹未成,举头失乡里”喻孝静帝的危险处境。孝静帝的皇后是高欢的女儿,孝静帝死后,高洋逼她再嫁,她的母亲娄后也无可奈何。这则童谣是对当时政治局势的总结与研判,暗蕴着对青雀子的同情与怜悯。齐武平二年(571年)童谣:“七月刈禾伤早,九月吃糕正好,十月洗荡饭碗,十一月出却赵老。”^[7]武平元年(570年)七月,和士开被杀,之后高俨被杀,綦连猛、赵彦深被贬。这则政治童谣正是对当时政局动荡,宫廷

流血事件的含蓄暗示。

著名的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8]采用对比手法,批判了汉桓帝、灵帝时的用人制度,尖锐嘲讽了世人的欺世盗名。张士信时有姑苏市井中童谣曰:“丞相做事业,专靠黄、蔡、叶。一朝西风起,干鳖(瘰)。”^[9]灵活的三句半形式,讽刺了张士信用人不当,一味宠信黄蔡叶(黄敬夫、叶德新、蔡彦文),导致最终之败局。《大宋宣和遗事》载宋钦宗时政治童谣:“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也表达了有识之士对朝廷言路阻塞的愤慨。

(三) 预言类童谣:对政治局势的预测

童谣中最具神秘色彩的是以“卜偃引童谣”等为代表的先验式政治预言。《晋书·天文志》释童谣:“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岁星降为贵臣;荧惑降为童儿,歌谣嬉戏;填星降为老人妇女;太白降为壮夫,处于林麓;辰星降为妇人。吉凶之应,随其象告。”^[6]三国时期,陆凯谏言吴主孙皓,“翼星为变,荧惑作妖,童谣之言,生于天心”^[10]。《淮南子·天文训》以“五星”即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辰星分别对应“五行”即木、火、土、金、水。“萤惑之说”与谶纬、阴阳五行等观念相结合,童谣的神秘色彩得到强化,其自身的语义模糊、表达隐晦,多用象征、双关、谐音,借助心灵纯净的儿童宣之于口等,也使其成为体现天意难测、天意难违的最佳载体。

北齐太宁二年(562年)娄太后有疾,太后令内史称自己为“石婆”。徐之才的弟弟徐之范引童谣“周里歧求伽,豹祠嫁石婆,斩豕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縠靴”^[11],徐之才解释,“歧求伽”是胡语“去了”之意,“豹祠嫁石婆”不吉。“斩豕作媒人”预示要开墓合葬,“唯得一量紫縠靴”预示娄太后四月将亡。后娄氏果然在四月一日死去。北齐和士开擅权,《隋书·五行志》载童谣曰:“和士开,七月三十日,将你上南台”,随后群童齐声“杀却!”^[7]按《隋书·和士开传》,高俨设计将和诤到南台杀死,实为二十五日。可见,预言也有不精确之处。

除预示人物命运外,预言类童谣还预示着朝代的更迭,《国语·郑语》记载西周宣王时童谣,“月将升,日将浸;栗弧箕服,实亡周国”,预示了西周的灭亡。前两句讲自然现象,月升日落,昼尽夜临,暗示阴盛阳衰;后一句是人事,栗弧即山桑木所制之弓,箕箒指箕木所制的盛矢之器具。最后一句是判语,也是童谣的点睛之笔,指出售卖桑木弓、箕箭袋的人会导致西周的覆灭。尽管周宣王竭力搜捕“栗弧箕

服”,却导致一对卖桑弓、箭袋的夫妻逃亡,路遇弃婴,收养了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主角——褒姒。《东周列国志》对这段史实加以敷衍,愈发凸显了人力的徒劳、天命的不可违。再如灵帝末京都童谣:“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芒。”^[4]侯、王分别指少帝刘辩与陈留王刘协。《三国演义》第三回便引此童谣,叙少帝、陈留王在洛阳北部北芒山出逃的狼狈景象,随后便有董卓仗势行废立皇帝之事。《三国演义》第六十五回有童谣:“若要吃新饭,须待先主来”,并强调童谣乃天意的指示,不可逆天而行,明示刘备要取代刘璋为新主。

二、政治童谣的社会功能

作为传达上天意志的特殊载体,历代统治者都对事关朝代鼎革的政治童谣十分警惕。《隋炀帝艳史》第三十七回写炀帝听到宫人唱:“河南杨柳谢,河北李花荣。杨花飞去落何处?李花结实自然成。”杨广认为这首带谶语色彩的童谣预示着李氏将兴,杨氏当败。该童谣在宋传奇《迷楼记》中已有记载,《艳史》却特别强调炀帝询问宫人童谣出处的情节,宫女说:“此歌乃道路儿童所歌,非贱婢自编。”炀帝由此认为这是上天的意旨,“此天启之也”,可见童谣之威。结合童谣的类型,政治童谣主要具有两大社会功能。

(一) 佐证史实的补史功能

政治童谣往往能紧跟时事,反映时人对朝代变革、人物功过、政治局势的认识、判断,甚至预测,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民众的好恶、民心的向背。“康衢童谣”便是突出代表。《古今事物考》以此童谣为依据,提出童谣自尧时起的观点。“康衢童谣”是尧微服私访时听到的,尧认为它反映了民众的真实心理,由此决心禅位于舜,可见,童谣从诞生之初便是统治者观民风、知民情的重要手段。

童谣从民众角度为史料记载提供了有益补充。如果说史书更多是从文人士大夫视角记载历史,童谣则更多反映下层民众的观点、见解,与史书相比,童谣表达的更为具体感性。唐高宗永淳元年七月雨灾前有童谣云:“新禾不入箱,新麦不入场。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墙。”^[12]揭示了盛唐文治武功、一片繁荣景象掩盖下农村灾后的凄凉景象。《旧唐书》有载,高宗永淳元年五月,洛水溢,居民千余家受灾;六月,“关中初雨,麦苗涝损,后旱,京兆、岐、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病,死者枕藉于路”“京师人相食,寇盗纵横……是秋,山东大水,民饥”^[13],这则童谣真实地再现了灾后农村的饥馑萧条。《述异记》载

汉末江淮间童谣：“太岳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贵如黄金。”《古今风谣拾遗》“贵如黄金”作“贵于黄金”，《太平御览》作“粟贵如金”，都反映了东汉末年饥荒灾年，饿殍遍野的惨景。类似的还有同样出自《述异记》的《洛中童谣》“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饱，千金何所值”等。

汉恒帝初京都有童谣“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春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4]蔡东藩《后汉演义》亦引此谣，对官府卖官鬻爵下的民怨沸腾做了生动形象的刻画。《广神异录》载唐玄宗天宝年间长安、洛阳流行的童谣：“不怕上兰单，唯愁答辩难。无钱求案典，生死任都官。”雷群明释“兰单”为“银铛”，“‘兰单’与‘银铛’音近，口语传唱时易于相混。”^[14]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造反，攻占东京洛阳，第二年又占领西京长安。两京沦陷后，部分官吏降敌，做了伪燕的官员。安史之乱平息后，伪朝官吏受审，童谣从受审叛官的角度写出了他们羞惭、惶恐、畏惧的心态，这是很罕见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二) 引导舆论的宣传功能

卜偃之所以能以童谣“丙之辰”为劝慰晋侯的理由，除其占验色彩外，还在于童谣具有引导舆论的宣传功能。

“荧惑降为童儿，歌谣嬉戏”一说深入人心，神秘了童谣的来源与性质，“童谣之言，生于天心”的观点使得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并警惕童谣的出现。中平年间，京师出现童谣“承乐世，董逃。游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带金紫，董逃。行谢恩，董逃……”。这首童谣很快引起了董卓的戒惧，据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董卓不仅禁止此童谣在民间的传唱，还将“董逃”改为“董安”以求吉兆。三国时吴帝孙皓欲将都城从建业迁到武昌，耗费大量民力物力，导致民怨沸腾。大臣陆凯反对迁都，引童谣为证：“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10]以此表明天意在建业，百姓态度坚定。《三国演义》第120回敷衍了这一情节，并说这就是“民心与天意”。

从历史经验来看，童谣的应验度也是极高的，多见于《五行志》中的“诗妖”，与诗讖、讖语等相比较，“童谣的预言准确性大得多”^[15]。因此，历代当政者也采取种种措施防止童谣被有心人利用。《全唐文》卷八九《南郊赦文》便有唐僖宗严惩“撰造童谣”者的记载。对童谣的敬畏使得其地位更加神圣，也更容易为野心家利用。“从现有材料看，我国古代童谣

大体上呈现出‘两多两少’的状况：乱世多，盛世少；王朝末期多，王朝早期少。”^[14]“童谣和变、乱有最密切关系，易代之际，政治黑暗、矛盾尖锐、大变将起的时候，总是童谣活跃的黄金季节，表明童谣有为人们指引未来政治方向的作用；时代越长，童谣越多，反之则少，是因为时代长，变化就多，时代愈短，则变化相对较少……”^[16]。

鼎革之际，各方政治势力纷纷借童谣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宣传自己是天命所归，反叛者更是利用童谣将其造反行为合理化。王莽末年流行于南阳郡的童谣曰：“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4]南阳郡是刘秀的老家，这则童谣明显是刘氏集团为刘秀的兴起造势。元至正十年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17]至正十一年，贾鲁主持黄河治理工程，官吏趁机搜刮百姓，民间苦不堪言。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农民起义军为造声势，利用此童谣，将石人埋入工程必经之地，以争取舆论支持。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唐末王仙芝的“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等，民谣、童谣都已成为争取舆论支持、为造反造势的基本工具。童谣也是政治团体宣传政策，帮助百姓理解政治主张的重要手段。《明季北略》记载了李岩编撰的政治童谣：“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另外，李岩还编撰了“迎闯王，不纳粮”等童谣，有力地宣传了李自成的农民政策，为起义军赢得了民众的支持。

此外，政治观点不同的派系也借童谣诬陷他人。《宋季三朝会要》载南宋时童谣，“大蜈蚣，小蜈蚣，尽是人间业毒虫。夤缘攀附有百足，若使飞天能食龙。”便是吴潜兄弟的政敌污蔑、构陷二人使用的政治手段。

三、结论

“康衢童谣”“卜偃引童谣”是我国古代政治童谣的典型代表。从形式表达看，“康衢童谣”直抒胸臆，语言简洁、直白；“卜偃引童谣”则结合星象术语，具有占卜色彩，含蓄委婉，它们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从内容表达看，古代政治童谣可分为品评类、断言类、预言类三种类型。品评类童谣最具现实针对性，坦率表达对当政者的爱憎，语言犀利率真；断言类、预言类童谣则在把握时局大势的前提下，对朝政局势做出判断、预测。尽管后者经常被神秘化为“天心”“天意”，但本质上乃是有识之士对政治事件的

认知的表达,与民间舆情发生碰撞、融汇后,经过民间百姓的调整、加工,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情舆论的载体,演变为民众表达愿望、宣泄不满、警示当政者的手段。尽管在这一过程中,野心家有意识的引导利用与心理暗示不容忽略,但总体来看,当政者的国家政治治理观,即政治价值观与民心民愿的契合度能否形成有效的社会共识,是决定童谣政治化过程成败的关键因素。因此,政治童谣的主要社会功能有二,即佐证史实的补史功能、引导舆论的宣传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18] 尽管古代政治童谣由于时代、环境的限制,不可避免的带有谏纬迷信的消极因素,但其中的合理内核,如对廉洁官员的赞颂、对清平政治环境的渴望、对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的痛恨等,在当代依然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当然,古代政治童谣内容丰富复杂,其中不乏歪曲事实、牵强附会之作,不能一概而论,但总体来看,大部分政治童谣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心民意。此外,童谣中还保留了一些古代的民间风俗,也是极为珍贵的,如《石痴别录》记载的元惠帝至正年间燕京童谣、《帝京景物略》记载的拜月叩星歌、都城小儿祈雨歌等。因此,于今人而言,拂去附着在童谣上的占星、谏纬、五行等神秘色彩后,研究古代政治童谣确实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历史、学习祖先的政治智慧,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总之,古代政治童谣在当代依然具有积极的认

识价值、研究价值,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做好继承与发展、创新工作,是当代童谣研究者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 [1] 杨伯峻. 列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79:143-144.
- [2]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6:339-340.
- [3] [晋]杜预. 春秋经传集解[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57.
- [4] [宋]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0:833;2334;2233;2232;2235.
- [5] [汉]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0:2557.
- [6] [唐]房玄龄.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0:548;205.
- [7] [唐]魏征.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0:431.
- [8] [晋]葛洪撰,杨明照校笺. 抱朴子外篇校笺[M]. 北京:中华书局,2000:393.
- [9] [清]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00:328.
- [10] [晋]陈寿撰. 三国志[M]. [宋]裴松之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0:1034;1034.
- [11] [唐]李百药. 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0:310.
- [12] [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0:606.
- [13] [后晋]刘昫.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0:74.
- [14] 雷群明,王龙娣. 中国古代童谣[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128;5.
- [15] 舒大清. 中国古代政治童谣与谏纬、谏语、诗谏的对比[J]. 求索. 2008(11):164-166.
- [16] 舒大清. 论中国古代政治童谣的消长规律[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2):25-28.
- [17] [明]宋濂等.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00:753.
- [18]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9-25.

[责任编辑 李瑞萍]

The Types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Nursery Rhymes: Taking Kangqu Nursery Rhyme and Buyan-cited Nursery Rhyme as Examples

LIU Li

(College of Arts,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Economics, B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 Both Kangqu nursery rhyme and Buyan-cited nursery rhyme are early political nursery rhyme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nt,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nursery rhym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namely, evaluation, assertion and prediction, which mainly involves the evaluation of political figures, the judgment of political situations, and the prediction of political situations, respectively. Their social functions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at is, supporting historical facts and guiding public opinion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and creatively inherit ancient political nursery rhymes.

Key Words: ancient political nursery rhymes; types; social functions